

熊明安

与

生存教育学



熊明安

熊明安 熊焰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熊明安

与

生存教育学

熊明安 熊焰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熊明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明安与生存教育学 / 熊明安, 熊焰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29-13445-7

I. ①熊… II. ①熊… ②熊… III. ①熊明安—
自传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9715号

熊明安与生存教育学

XIONG MING'AN YU SHENG CUN JIAOYU XUE

熊明安 熊焰 著

责任编辑: 康聪斌 吴 昊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彭平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天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 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36千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445-7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 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熊明安教授



熊明安教授



熊明安教授



熊明安女儿熊焰



熊明安教授(右一)与儿子熊非(中)、学生刘良华(左一)



熊明安和女儿熊焰

前言

1996年前后，我跟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商议，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学派。我个人最初的设想是创建“西南学派”。由于我对“高等教育”“民国教育”“教育家”等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学界也有人将我的思路称为“西南派”。

后来，我们放弃了以地域、地缘的方式命名，直接将我们的教育研究路子称为“自我教育学派”。2010年，我们在广州召开了“自我教育学研讨会”。

2012年，考虑到自我教育学的自我概念离心理学更近而离教育学较远，因而将我们的研究正式称为“生存教育学派”。那年，我们在长沙召开了“生存教育学研讨会”。

近年来，团队成员利用国庆节的假期，在成都聚会，召开大小规模不同的研讨会，围绕生存教育学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立场，提出改进和发展的建议。同时，他们建议我用教育自传的形式，记录我个人的成长与生存教育学的内在关联。

在撰写自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我们所提倡的生存教育学派虽然有自己特别的主张和

立场，但这些主张和立场与其说是我们的独创，不如说是我们的选择。中国教育学向来有诸子百家的争鸣，百家之争，以儒家教育学派影响最大。而在儒家教育学派内部，一直有心学和理学的分歧。生存教育学派只是在已有的传统中综合了心学和理学的各种主张。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理学为体，心学为用。在教育目标上接受理学的主张，而在教育方法和教育过程中更倾向于心学思路。

我个人的一生，尤其是三十而立之后，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总体上倾向于心学。我所佩服者，乃心学所追求的自信与刚毅。只是，在倾心追慕心学之自信与刚毅的同时，我亦服膺理学所推崇之“道问学”与谦逊。在我所记录的传记文字里，处处可以看到理学如何为体、心学如何为用。



目 录

001	前 言
001	第一章 儿童时代
005	第二章 小学和初中
013	第三章 四川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016	第四章 停学在家当农民和兼任乡农会文书
019	第五章 做小学教师与参加社会活动
028	第六章 充满波折的考大学、上大学及工作经历
041	第七章 度过艰难岁月
047	第八章 重新回到教学研究岗位
057	第九章 退休后的学术研究
059	第十章 影响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关键事件
099	第十一章 我的学术追求
129	第十二章 做学术研究的几点体会
135	第十三章 关于自我教育
147	第十四章 生存教育学派的几个假设
164	第十五章 创建生存教育学派的历程
171	第十六章 生存教育学派的立场
185	第十七章 关于生存教育学的讨论

附录 论文选编

- 200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历史回顾与改革意见
- 218 梅贻琦教育思想初探
- 226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贡献
- 240 一次大胆的成功尝试——读田建国的《高等教育学》
- 246 简论高校教师素质与教学科研水平的关系
- 260 从《华西医科大学校史》谈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 2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普通中学课程改革述评
- 296 我国高等学校几次重大调整的回顾与评价
- 316 民国时期的教育辅导制度
- 32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统辖区内高等学校管理改革的意义与启示
- 340 我国古代重民、教民与重教的传统思想和普及初等教育
- 356 民国时期私立高等教育的简要评述
- 369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散论
- 382 中国当代教育实验的几点启示——《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编后感
- 391 来自学生的感想
- 403 后记

第一章 儿童时代

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来凤乡一村熊家湾，这里原名樊家沟。据说，原来是以樊姓人家为主住在这条沟里，因此得名。清朝末年樊家将土地分别卖给康家、熊家和陈家，自己却离开农村去城市经商。那时，我的祖父熊开麟佃租了樊家沟的土地 10 亩和草房数间，是比较有能力的佃耕农。因为樊家的人急于离开农村，就要将我祖父佃租的这片土地和房屋卖给我家，可是，祖父突然病逝，家里根本没有钱买这些土地与房屋。于是，樊家就将我的祖母和大伯父告到清政府的安岳县衙门。那时，我的父亲还很小，祖母背着我年幼的父亲与大伯父一同去县衙门和樊家打官司。经过县政府的审理，强逼我家买下樊家的土地与房屋。为了支付买地和房屋的钱，祖母和大伯父做主，除了向亲友借贷之外，就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和口粮卖了才筹足这笔费用。口粮卖了之后，家里没有吃的，就只能用瓜、菜、杂粮作为口粮，而且实行吃“对时饭”，即今天这个时候吃了“饭”，到明天这个时候才吃“饭”。也就是说一天只吃一餐“饭”。这样熬了一年多的光景，终于把买地所欠的债务还清。从

此，我们家才由佃户变成了有田地耕种的自耕农民。

据长辈说，我家的祖籍在江西省丰城县登仙乡下村堡。清朝康、乾时期随移民大潮来四川乐至县盘龙乡某村落户。入川的始祖是熊高茂、熊高宪兄弟二人，传到曾祖父熊景胤时，他在境临的安岳县来凤乡买了田地数十亩，并与蓝氏曾祖母养育了五个儿子。他们把田地分给五个儿子，即熊运兴、熊运隆、熊运旺、熊运相、熊运伦，就是后来发展为熊家的五大房人。

我的父亲是第四房熊运相的后裔，他又有兄弟姐妹七人：大伯父熊人宽（号阔然）、二伯父熊人田（号纪云）、三伯父熊人谦（号受益）和我的父亲熊人爵（号伯农），以及大嬢（嫁到罗家）、二嬢（嫁到周家因为姑爷早年病逝，又改嫁到胡家）和三嬢（嫁到伍家）。父亲年幼时，经祖母和大伯父商量，决定送他去上小学读书。当时在我们家乡只有清政府设立的初等小学堂，他读完小学后，家里没有钱送他去县城的高等小学堂读书。于是就送他去跟随当地的名医龚翥生学习中医，所以，我父亲熊伯农（原名人爵）成年后既是农民，又是乡村里的中医生，不仅务农种地，又从事医药服务活动。有人请他治病或买药，他就去医病与卖药，其余时间就干农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封锁，农村缺医少药，又疫病流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治好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病人。当时就有民谣说：“狮子崖（因为修公

路已经挖掉了)，熊家湾，出了一个活神仙，医瘟病真得行，好像唐朝孙真人（即孙思邈，人们尊称他为药王）。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基本上脱离农村，参加乡里的卫生协会工作，专门从事医疗服务。直到1962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压缩公职人员，父亲被迫辞职回家，才从国家认定的正式医生转变为一个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因为他的医术精湛，生产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邀请他到“大队合作医疗队”做顾问，义务服务，指导年轻医生处方治病。“文革”结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废除，但仍然有不少人熟知他医术精深，到家里来请求他治病。所以，他一直没有闲着，直到1996年10月，因肺心病逝世为止（享年80岁），他都在医疗战线勤奋工作。

我的家乡是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属于浅丘陵的南北分水岭地带，多土少田，农产品主要出产红薯、玉米等杂粮。这也是老百姓的基本口粮。气候干燥少雨，冬寒夏热。记得有一年天旱，田里、土里都没有收成，一般贫苦农民都没有吃的，饿着了就只有去挖白黄泥土吃，俗话叫“吃观音土”。我小时候饿了也跟着大人去“吃观音土”。我生长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自然就营养不良，个头矮小。入小学前，就与我年纪相当的几位堂兄弟一起玩耍，常常在一起玩耍的有二伯父的儿子五哥哥（即比我大几岁的熊文近）、比我小的大伯的儿子六元子（即熊文尧），还有三伯父的小儿

子疳娃儿（因为身体瘦弱没有成年就病死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偷”二伯、三伯家的红苕，给老祖母送去，以此可以得到祖母赏赐的一颗核桃。祖母的口粮由她的四个儿子供给，本来是够她食用的。但是，祖母把她的口粮给了她最心爱的小女儿——我们的五姑妈。这位姑妈很穷苦，每逢乡场的赶场天她都要到来凤乡赶场，以便到祖母家吃饭和拿走一些祖母的粮食。因此，祖母的口粮就不足了。我们几个小孙子知道哪家在地窖里取红苕，就采用“偷”的方法，“偷”到了就给祖母送去，以求得祖母的欢心而给我们核桃。我们家里有一株大核桃树，结的核桃归祖母所有，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占有，唯有祖母才有支配的权利。我们几个小娃娃，见到哪家在取红苕，就联合起来去“偷”，并将所“偷”得的红苕给祖母送去。

由于祖母缺乏口粮，常常不吃晚餐以节约粮食。我的母亲就经常叫我给祖母送晚餐去，我得到核桃的机会也特别多。可能我小时候吃的核桃相对多些，使我后来的头脑也比较灵活，记忆力也比较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感谢祖母赏赐我的核桃。

另外，在我的儿童时代，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战时首都重庆的时候，飞机从我家对面铜鼓坡的上空经过，就如天上一群麻雀在飞，我们几个小兄弟一点也不害怕，还叫着喊着快到外边去看飞机，一天要经过几次飞机，我们就喊叫几次。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时日本轰炸重庆十分频繁，重庆一天都要拉几次警报。

第二章 小学和初中

我是九岁才上小学，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非常瘦弱，个子也很矮小，可能是缺乏营养吧，因此，父母让我九岁才入小学。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即1940年10月），母亲就因病去世了，那时我年纪小，不懂事，对母亲死了并不很悲痛。记得母亲病危时，二哥（他和我在所学校就读，只是在读高年级）到我们班上来叫我立即回家。到了家后，大家都守候在母亲床前，而我却去井边捉小蝌蚪玩去了。还是二哥来找我，才拉到母亲床边并和全家人一道，送别母亲离开人世。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惭愧。

母亲为人很好，她对几个伯母非常尊重，又能够诚恳待人、宽以容人，十分疼爱儿女。但母亲并非无原则的护着子女，她对儿女要求严格。记得我没有上学前，在朝门前竹林玩耍，大伯母恰巧从那里经过，我讲了几句对老年人不敬的话被伯母听见，她就教育指责我的不对，我不但不接受，还和伯母辩白起来。这时母亲正躺在病床上，她听到我和伯母辩论，就在床上大声地叫我说：“龚娃儿（我的小名）快来我这里拿糖哟。”以此阻止我和伯母的辩白，同时便于她教育

我。当我跑到母亲的床边，母亲抓住我，狠狠地打了我几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听大妈的教育？还和大妈辩白？”她警告我，以后再不能像今天这样和长辈辩论、争辩，否则就会有更严厉的惩罚。现在记起这事来都感到很内疚。

我还清楚地记得读五年级上学期时，因为不懂事学习不努力，造成两科不及格，被留级一次。幸好那时的小学高年级实行春、秋两季招生，于是我读了两个五年级上学期，一共读了六年半的小学。在小学阶段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头上生了癞疮，又疼又痒又难看，很不舒服。在家乡请医生治疗也没有治好。于是求在国民党部队当医护兵的二哥想办法，他从部队寄回了一些药给我治疗。这些药物擦上之后，头皮立刻就肿了，之后马上结痂，并很快长起新肉新发。癞子迅速好了，当时我就认为西药比中药好得快。

记得读五年级时，与康忠胜一同玩弓背跳游戏，正由我按着他的背向上跳跃时，他忽然将背往下一沉，我就没有摸着他的背。于是我扑了个空，跌倒在地，把右脚背伤了。当时害怕父亲责备，没有给家里讲，让它自己好起来，结果在右脚背上长了一个小小的突起硬块，留下了终身的印记。

我上小学当然是遵从父母的使命，同时也因为我自己害怕劳动。上学就意味着可以躲避农业劳动。这是我上学读书的最基本动力。父亲跟我有约在先：“读得就读，读不得就回家种地。”我那时最怕种地劳动，